

中国现代大学 中国现代文学

王彬彬 主编

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
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重大项目
获南京大学“985工程第三期资助。

文学与大学有着非常密切的
历史上，可以把中国新文学
与文学社团的发展史表现，
多是大学的师生。

中国现代大学 中国现代文学

□ 王 德 胜 主 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/王彬彬主编. 一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1

ISBN 978-7-208-09942-5

I. ①中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高等学校-关系-中国文学:现代文学-研究 IV. ①G649.28 ②I206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72086 号

责任编辑 朱慧君

封面装帧 北戈工作室

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

王彬彬 主编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江苏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3.5 插页 4 字数 347,000

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09942-5/I·888

定价 35.00 元

目 录

导论 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
相互哺育 / 001

第一编 北大、清华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

第一章 北京大学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 / 025

第二章 北大、清华师生文学批评对新文学
发展的作用 / 048

第三章 北大、清华师生文学创作对新文学的
示范意义 / 079

第四章 北大、清华师生文学活动对新文学的
环境营建 / 101

第二编 上海现代大学与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

第五章 上海现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之关系
综论 / 135

第六章 复旦开启新文学进入大学讲堂之
先声 / 163

第七章 中国公学的双重革新 / 207

第八章 光华大学的保守与反保守 / 240

第九章 上海大学与中国左翼文学 / 284

第三编 北京(平)、上海以外的 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之关系

第十章 西南联大对新文学传统的坚守与
发扬 / 315

第十一章 南京、武汉、桂林等地的现代大学的
新文学活动 / 378

后记 / 428

导论 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相互哺育

“五四”新文学起源于蔡元培掌校后的北京大学。从北京大学的《新青年》，流出了胡适的新诗，流出了鲁迅的白话小说，流出了胡适、陈独秀、周作人等人的理论文章。新文学最初的一批作者，大都是北京大学的师生；新文学最初的那些作品，大都发表于北京大学的《新青年》和《新潮》两种刊物。继北京大学之后，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师生，也成为新文学创作的生力军。可以说，在左翼文学兴起前的十来年里，中国现代文学是以中国现代大学为依托的。20年代末期，左翼文学和“海派小说”兴起，新文学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。以北京为中心、以自由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新文学，仍然是以北大、清华、燕京等几所大学为根据地，而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学和“海派小说”则开始与大学相分离。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里，有所谓“京派文学”与“海派文学”之分，而这时期“京派文学”的作者，基本是北方一些大学的师生。抗战爆发，新文学从外在的格局到内在的精神都发生巨变。全面抗战开始后，文学进一步与大学分离，但由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，仍然活跃着一批热衷于新文学创作的师生。

中国新文学起源于大学。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间，新文学与现代大学的关系虽然并非一成不变，虽然在总体上新文学逐渐与大学相脱离，但毕竟在各个时期新文学与大学之间都有着某种程度的关系。1949年后，新文学进入了所谓“当代”，与大学的关系也基本断绝。一方面是大学的教师或学生，另一方面又是活跃于文坛的文学创作者，这样一种身份合一、一身二任的现象，进入“当代”后基本绝迹。到了90年代，文学与大学之间又开始发生关系，一批本在大学之外从事文学创作、身份

本是“作家”的人，成了大学的教授或兼职教授，成了大学里的“硕导”或“博导”，甚至被聘为大学的文学院长。贾平凹、王蒙、王安忆、莫言、余华等人如今就或在一家或在多家大学当“兼职教授”、“带”研究生，或干脆双脚踏进大学成了专职的教授、“硕导”、“博导”。表面看来，这是在恢复新文学的一种传统。但实际上，今天的这种状况，与1949年以前仅仅只有表面的相似，骨子里不可同日而语。

重建文学与大学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。要重建文学与大学的关系，就要弄明白在1949年以前文学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一回事。

1917年1月4日，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，1月11日，即以学校名义致函北京政府教育部，要求批准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。13日，教育部复函北京大学，批准陈独秀为文科学长。1月15日，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。按照与蔡元培的约定，《新青年》也随陈独秀进入北大。在1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五号上，已经发表了胡适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。2月1日，《新青年》第二卷第六号出版，这是《新青年》进入北大后出版的第一期。在这一期上，陈独秀发表了响应胡适《文学改良刍议》的《文学革命论》。文学革命的号角于是吹响。陈独秀在答应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同时，向蔡元培推荐了尚在美国的胡适。1917年7月，胡适应蔡元培之邀回国，9月就任北京大学教授。这时，胡适后来收入《尝试集》中的一些新诗也开始陆续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。在1918年4月15日出版的《新青年》第四卷第四号上，胡适发表了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》。1918年1月，《新青年》改组为同人刊物，成立编委会，由陈独秀、胡适、李大钊、钱玄同、高一涵、沈尹默六人轮流主持。周作人也于1917年9月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。在1918年12月15

日出版的《新青年》第五卷第六号上，周作人发表了《人的文学》一文。鲁迅虽迟至1920年8月才被聘为北京大学讲师，但在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《新青年》第四卷第五号上，鲁迅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，从此一发而不可收，几年间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了大量作品。这期间，被蔡元培聘入北大的钱玄同、刘半农、李大钊等，也是《新青年》的重要作者。如果把蔡元培主持的北大比作一座山，那《新青年》就是这山上的一孔清泉，从这里流出了新的文学思想、新的诗歌、新的小说、新的散文；从这里出发，新文学流成了一条大河。香港学人陈万雄在其专著《五四新文化的源流》中说道：“陈独秀之往掌北大文科，促使了北大原有革新力量成为《新青年》作者，这一刊一校革新力量的结合，倡导新文化运动才形成了一个集团性的力量。”^①

论及新文学初期的情形，还不能不说到北大学生创办的《新潮》月刊。1918年秋，北大学生傅斯年、罗家伦等成立“新潮社”，在陈独秀等人的支持下，创办了刊物《新潮》。《新潮》与《新青年》相辅相成、相得益彰，为新文学的站稳脚跟和发展壮大，作出了重要贡献。1950年12月20日，傅斯年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猝然辞世，罗家伦在1950年12月31日出版的台北《中央日报》上，发表《元气淋漓的傅孟真》一文以示哀悼，其中说：“一九一八年，孟真和我还有好几位同学抱着一股热忱，要为文学革命而奋斗。于是继《新青年》而起组织新潮社，编印《新潮》月刊，这是在这个时代中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第二个刊物。我们不但主张，而且实行彻底地以近代人的语言，来表达近代人的思想，所以全部用语体文而不登载文言文。我们主张文学主要的任务，是人生的表现与批评，应当着重从这个方面去使文学美化和深切化，所以我们力持要发扬人的文学，而反对非人的与反人性的文学。……其实我们天天与《新青年》主持者相接触，自然彼此间都有思想的交流和相互的影响。

^① 陈万雄：《五四新文化的源流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月版，第43页。

不过,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,仿佛《新潮》的来势更猛一点,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。《新潮》的第一卷第一期,复印到三版,销到一万三千册,以后也常在一万五千册左右,则声势不可谓不浩大。”

论及这一时期大学与文学的关系时,另一群大专院校的学生不能不提,他们是郑振铎、瞿秋白、耿济之、许地山、瞿世英、王统照,还有其时在北京大学旁听并参加了北大“新潮社”的郭绍虞。1917年夏,郑振铎来到北京,考入交通部所属的铁路交通学校。而同年暮春,瞿秋白来到北京,考入外交部所属的俄文专修馆。耿济之与瞿秋白同时考入俄文专修馆,入学后两人成为同班同学。许地山和瞿世英,其时同是北京汇文大学的学生(1919年,北京汇文大学、华北协和女子大学、通州协和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),王统照则是北京大学学生。瞿秋白、郑振铎、耿济之、许地山、瞿世英等人恰好都住在东城根一带,又加上共同的兴趣和志趣,很快便聚集在一起。1919年11月,郑振铎、瞿秋白、耿济之、瞿世英等人合办的旬刊《新社会》出版。《新社会》主要发表批评社会的文章,但也发表新文学作品。在《新社会》第一号上,郑振铎发表了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新诗《我是少年》:

我是少年! 我是少年!
我有如炬的眼,
我有思想如泉。
我有牺牲的精神,
我有自由不可捐。
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,
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。
我起! 我起!
我欲打破一切的威权。

这首诗,表现的是典型的“五四”精神。叶圣陶晚年在为《郑振铎选集》作序时写道:“振铎兄的这首《我是少年》发表在‘五四’运动之后不

久,可以说是当时年轻一代人觉醒的呼声。这首诗曾经有人给配上谱,成为当时青年学生普遍爱唱的一支歌。”^①1920年5月,《新社会》办到第十九号时,被北京警察当局查禁。郑振铎、瞿秋白等人又于8月间创办了《人道》月刊,但也出版了一期便因经费无着而停刊。

这时期,这群青年学生对俄罗斯文学发生了强烈的兴趣。郑振铎在《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》中回忆道:“我们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个共同的趣味就是搞文学。我们特别对俄罗斯文学有了很深的喜爱。秋白、济之是在俄文专修馆读书的。在那个学校里,用的俄文课本就是普希金、托尔斯泰、屠格涅夫、契诃夫等的作品。济之偶然翻译出一二篇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出来,大家都很高兴它们。”^②瞿秋白、耿济之等直接从俄文阅读俄罗斯文学,郑振铎等则找来英译俄罗斯文学作品阅读。读好的外文作品而产生翻译的冲动,是很自然的。郑振铎们也不例外:“我们这时候对俄国文学的翻译,发生了很大的兴趣。秋白、济之,还有好几位俄专里的同学,都参加翻译工作。我也译些契诃夫和安得烈耶夫的作品,却都是从英文转译的。同时,也看些用英文写或译的俄国文学史,像小小的绿皮的家庭丛书里的一本《俄国文学》,就成了我们怀中之宝。秋白他们译托尔斯泰、屠格涅夫、高尔基的小说,普希金、莱蒙托夫的诗,克雷洛夫的寓言,其中有关于作家的介绍,就是由我从那本小书里抄译出来的。我当时写信给在日本的田汉同志,希望他能介绍些俄国文学史给我们。”^③瞿秋白、耿济之等人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,是中国直接从俄文原著翻译俄罗斯文学之始。这期间,有几种他们翻译的俄国文学作品集出版。瞿秋白、耿济之等翻译的《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》由共学社出版,郑振铎、耿济之等多人翻译的《俄国戏曲集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,耿济之、沈颖等翻译的《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》第一集由

① 叶圣陶:《(郑振铎选集·序)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,第1页。

②③ 郑振铎:《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》,见《忆秋白》一书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版,第109页、第111页。

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。在翻译俄罗斯文学的同时,郑振铎、瞿秋白、耿济之等人还有不少介绍、评析俄罗斯文学的文章。俄罗斯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。这一时期,瞿秋白、郑振铎、耿济之等一群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与评介,实际上在间接地从事着中国新文学的创造。

1920年10月,瞿秋白以北京《晨报》和上海《时事新报》特派记者的身份起程赴苏联。1921年1月4日,中国第一个文学社团“文学研究会”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宣告成立。当时公布的12位发起人是:周作人、朱希祖、耿济之、郑振铎、瞿世英、王统照、沈雁冰、蒋百里、叶绍钧、郭绍虞、孙伏园、许地山。这12人中,周作人、朱希祖是北大教授,他们同蒋百里、叶绍钧、沈雁冰、孙伏园等人显然是被拉来壮声势的,且叶绍钧、沈雁冰也并未未来京参加成立大会。耿济之、郑振铎、瞿世英、王统照、许地山这几个学生无疑是“文学研究会”真正的筹划者。“文学研究会”的成立,并非心血来潮之举。郑振铎、瞿秋白、耿济之等人几年间在从事俄罗斯文学的翻译评介过程中,逐渐形成了发起成立一个文学社团的想法。“文学研究会”正式成立时,瞿秋白已离开北京,所以无缘成为发起人,但应该认为瞿秋白是实际上的发起人之一。另一个应该强调的是,“文学研究会”完全是俄罗斯文学所催生的。“文学研究会”的宗旨是要在中国创造新文学,至于如何创造新文学,是以俄罗斯文学为参照、为榜样的。周作人起草的宣言中说:“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,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,现在已经过去了。我们相信文学也是一种工作,而且又是于人很切要的一种工作。治文学的人,也当以这事为他一生的事业,正同劳农一样。”这样的一种对文学的认识和要求,也是俄罗斯文学赋予的。是托尔斯泰、屠格涅夫、契诃夫、果戈理等人让郑振铎们对文学具有了这样一种观念。

这时期,北京的清华学校也活跃着一批热衷于新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学生。闻一多1913年考入清华学校,1922年离开清华学校赴美留

学。闻一多的新诗创作和研究,起步于清华学校求学时期。1923年9月,闻一多的第一部诗集《红烛》出版。《红烛》全书分为“李白篇”、“雨夜篇”、“青春篇”、“孤雁篇”、“红豆篇”,其中“李白篇”、“雨夜篇”、“青春篇”都写于清华学校时期。在热情地创作新诗的同时,闻一多还热心于新诗的理论批评与研究。在1921年3月11日出版的《清华周刊》第211期上,闻一多发表了《敬告落伍的诗家》一文,对清华学校国文部的文化保守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。文章一开头便强调“诗体底解放早已成了历史的事实”,而清华学校却“人人都摇起笔来,‘平平仄仄……’的唱开了,把人家闹了几年的偌大一个诗体解放底问题,整个忘掉了”。闻一多进而写道:“我诚诚恳恳地奉劝那些落伍的诗家,你们要闹玩儿,便罢,若要真做诗,只有新诗这条道走,赶快醒来,急起直追,还不算晚呢。若是定要执迷不悟,你们就刊起《国故》来也可,立起‘南社’来也可,就是做起试帖来也无不可,只千万要做得搜藏一点,顾顾大家的面子。有人在那边鼓着嘴笑我们腐败呢!”^①不仅是闻一多热衷于新文学的创作和研究,那时的清华学校学生梁实秋后来回忆道:“我从事文艺写作是在我进入高等科之初,起先是几个朋友(顾毓琇、张忠绂、翟桓等)在校庆日之前凑热闹翻译了一本《短篇小说作法》……我们的组织名为‘小说研究社’,向学校借占了一间空的寝室作为会所。后来我们认识了比我们高两级的闻一多,是他提议把小说研究社改为‘清华文学社’,添了不少新会员,包括朱湘、孙大雨、闻一多、谢文炳、饶子离(孟侃)、杨子惠(世恩)等。……这时候我和一多都大量的写白话诗,朝夕观摩,引为乐事。”^②

1925年5月,闻一多中止在美国的留学,回到国内,任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教务长,对新诗的热情却仍未稍减。徐志摩主编《晨报副镌》,每

① 闻一多:《敬告落伍的诗家》,见《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》,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,第101—102页。

② 梁实秋:《清华八年》,见《梁实秋文坛沉浮录》,黄山书社1992年1月版,第141页。

周出诗刊一次，这诗刊就由闻一多编辑。这期间，闻一多的书房成了一群新诗人聚会的场所。闻一多将自己的书房装饰得别具一格，因而给来过的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例如，蹇先艾在《忆闻一多同志》中有这样的回忆：“他的那间书房，凡是到过的人都记得很清楚，完全用黑纸裱糊，诗人仿武梁祠画像，细笔勾勒了一些人物、车马的图形，在高悬的电灯照耀之下，显得格外神秘、阴森；当然也别具一种艺术风格。”^①到闻一多书房来读诗、品诗、谈诗者，大都是在北京求学的学生。沈从文在《谈朗诵诗》中对这时期闻一多书房的诗歌活动有这样的介绍：“在客厅里读诗供多数人听，这种试验在新月社即已有过，成绩如何我不知道。较后的试验，是在闻一多先生家举行的。他正从国外学画归来，在旧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任教务长职，住家在学校附近京畿道某号房子。那时他还正存心做画师，预备用中国历史故事作油画，还有些孩子兴趣或摩登幻想，把家中一间客厅墙壁表糊得黑黑的，（除了窗子完全用黑纸糊上！）拦腰还嵌了一道金边。《晨报》社要办个诗刊，当时京派诗人有徐志摩、闻一多、朱湘、刘梦苇、孙大雨、饶孟侃、杨子惠、朱大枬诸先生。为办诗刊，大家齐集在闻先生家那间小黑房子里，高高兴兴的读诗。或读他人的，或读自己的。不特很高兴，而且很认真。结果所得经验是，凡看过的诗，可以从本人诵读中多得到一点妙处，以及用字措词的轻重得失。凡不曾看过的诗，读起来字句就不大容易明白，更难望明白它的好坏。闻先生的《死水》、《卖樱桃老头子》、《闻一多的书桌》，朱先生的《采莲曲》，刘梦苇先生的《轨道行》以及徐志摩先生的许多诗篇，就是在那种能看能读的试验中写成的。这个试验既成就了一个原则，因此当时的作品，比较起前一时所谓五四运动时代的作品，稍稍不同。修正了前期的‘自由’，那种毫无拘束的自由，给形式留下一点地位。对文学‘革命’言，有点走回头路，稍稍回头。刘梦苇先生的诗，是在新的歌行

^① 蹇先艾：《忆闻一多同志》，见《闻一多纪念文集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8月版，第228页。

情绪中写成的。饶孟侃先生的诗，因从唐人绝句上得到暗示，看来就清
清白白，读来也节奏顺口。朱湘先生的诗，更从词上继续传统，完全用
长短句形式制作白话诗。新诗写作原则是赖形式和音节作传达表现，
因此几个人的新诗，都可读可诵。”^①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所谓“新格律
诗派”，就是这样形成的。

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里，大专院校的师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

二

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里，当然并非所有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都
与中国现代大学有直接的关系。郭沫若的《女神》就是在日本留学时期
写成的。1921年6月出现的“创造社”，发起者也都是留日学生。进入
30年代，文坛上有所谓“京派”与“海派”之分。属于“海派”的文学，虽
然也并非与现代大学毫无关系，但总体上则是与大学相分离的。而属
于“京派”的文学，却仍然与现代大学保持着密切的关系，它基本上是一
种大学师生的文学。其时北京（北平）的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和燕京大
学的教师和学生，构成了“京派”文学的基本队伍。在北大任教的朱光
潜，以批评家的身份积极介入了当时的新文学活动；在清华任教的朱自
清、闻一多，本身便是新文学的重要作家。通过他们，新文学与现代大
学的关系延续着、发展着。

1933年7月，结束了八年留欧生活回到国内的朱光潜，把他的《诗
论》初稿送到了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手边。胡适读后立即决定聘
请朱光潜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，开设西方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史课
程。朱光潜还同时在北大中文系、清华中文系、北平大学、中央艺术学
院、辅仁大学等处兼课，讲授“文艺心理学”和“诗论”。朱光潜在讲课的

^① 沈从文：《谈朗诵诗》，见《沈从文全集》第17卷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，第244—245页。

同时,还对其时的文坛投注了很大的热情。直到抗战爆发,朱光潜一直住在地安门里的慈慧殿三号,家中的客厅很宽敞。朱光潜在家中定期举办“读诗会”,参加者基本上是北京各大学热衷于新文学的师生。“‘读诗会’的目的是研究新诗应该怎么做,研究‘诵诗的艺术’,每月一至两次,参加的人实在不少,北大有梁宗岱、冯至、孙大雨、罗念生、周作人、叶公超、废名、卞之琳、何其芳、徐芳等;清华有朱自清、俞平伯、李健吾、林庚、曹葆华等;此外还有冰心、凌叔华、林徽因、周煦良、萧乾、沉樱、杨刚、陈世骧、沈从文、张兆和,以及当时在北京的两位英国诗人尤连·伯罗和阿立通等等。”^①沈从文对朱光潜家中的“读诗会”则有这样的回忆:

北方《诗刊》(引按:指闻一多主持编辑的《晨报·诗镌》)结束十余年,……北平地方又有了一群新诗人和几个好事者,产生了一个读诗会。这个集会在北平后门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,参加的人实在不少。计北大梁宗岱、冯至、孙大雨、罗念生、周作人、叶公超、废名、卞之琳、何其芳、徐芳……诸先生,清华有朱自清、俞平伯、王了一、李健吾、林庚、曹葆华诸先生,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、周煦良先生等等。这些人或曾在读诗会上作过有关于诗的谈话,或者曾把新诗,旧诗,外国诗,当众诵过,读过,说过,哼过。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,就是新诗在诵读上,有多少成功可能?新诗在诵读上已经得到多少成功?新诗究竟能否诵读?差不多集所有北方系新诗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,这个集会可以说是极难得的。

这个集会虽名为读诗会,我们到末了却发现在诵读上最成功的倒是散文。徐志摩、朱佩弦和老舍先生的散文。记得某一次由清华邀来一位唐宝鑫先生,读了几首诗,大家并不觉得如何特别动人。到后读到老舍先生一篇短短散文时,环转如珠,流畅如水,真有不可形容的妙处。

^① 商金林:《朱光潜与中国现代文学》,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版,第95页。

从那次试验上让我们得到另外一个有价值的结论，一个作者若不能处理文字和语言一致，所写的散文，看来即或顺眼，读来可不好听。新诗意义相同。有些诗看来很有深意，读来味同嚼蜡。一篇好散文或一首好诗，想在诵读上得到成功，同时还要一个会读它的人。

当时长于填词唱曲的俞平伯先生，最明中国语体文字性能的朱自清先生，善法文诗的梁宗岱、李健吾先生，习德文诗的冯至先生，对英文诗富有研究的叶公超、孙大雨、罗念生、周煦良、朱光潜、林徽因诸先生，此外还有个喉咙大，声音响，能旁若无人高声朗诵的徐芳女士，都轮流读过些诗。朱、周二先生且用安徽腔吟诵过几回新诗旧诗，俞先生还用浙江土腔，林徽因女士还用福建土腔同样读过一些诗。总结看来，就知道自由诗不能在诵读上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效力。不自由诗若读不得其法，也只是哼哼唧唧，并无多大意味。多数作者来读他自己的诗，轻轻的读，环境又优美合宜，因作者诵读的声容情感，很可以增加一点诗的好处。若不会读又来在较多人数集会中大声的读，就常常不免令人好笑。

这个集会在我这个旁观者的印象上，得来一个结论，就是：新诗若要极端“自由”，就完全得放弃某种形式上由听觉得来的成功。但是这种“新”很容易成为“晦”，为不可解。废名的诗是一个极端的例子。何其芳、卞之琳几人的诗，用分行排比增加视觉的效果，来救听觉的损失，另是一例。若不然，想要从听觉上成功，那就得牺牲一点自由，无妨稍稍向后走，走回头路，在辞藻与形式上多注点意，得到诵读时传达的便利，林徽因、冯至、林庚几人的诗，可以作例。^①

从沈从文的回忆可看出，这些大学的师生，在一起进行着深层次的文学交流，他们从事着创作实验，探讨着创作规律。整个北方文坛，几乎就定期装在了朱光潜的客厅里。大学与文学，在朱光潜的客厅里如

^① 沈从文：《谈朗诵诗》，见《沈从文全集》第17卷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，第247—248页。

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

012

此难解难分。

1925年,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,朱自清即被聘为国文教授。1928年,国民政府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,以《玉君》等小说闻名的新文学作家杨振声担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,朱自清积极协助杨振声创建了中文系。1928年度第二学期开学,朱自清便开设了“中国新文学研究”课。将新文学引进大学课堂,这无论对于中文系的教学研究还是对于新文学发展,都具有划时代意义。清华大学不仅开设了“新文学研究课”,还开设了“新文学习作”课。学生在课堂上听到对新文学的讲解,又动手从事新文学创作,即使培养不出像样的新文学创作者,至少可培养出像样的新文学欣赏者,而这对新文学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。1930年度第一学期开学,朱自清又应燕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郭绍虞邀请,到燕京中文系兼课,讲授“中国新文学研究”。1933年,朱自清又应北师大国文系主任钱玄同邀请,到北师大国文系兼课,也讲授“中国新文学研究”。这说明朱自清的这门课,在其时的北京高教界,是很有影响的。作为大学教授,朱自清的“本业”是中国古典文学。既研究和讲授古典文学,又研究和讲授新文学,同时还以著名新文学创作者的身份活跃于文坛——大学与新文学,在这样的教授身上,本来完美地统一着。

1932年8月,闻一多离开青岛,回到清华园,应聘为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。这时期,闻一多自己虽新诗创作的热情已衰退,但关心新文学发展之心、扶助新文学成长之意,并未稍衰,对各大学有志于新文学创作的学生,闻一多尤其尽力指导、奖掖。1933年夏,时为北京大学四年级学生的林庚出版诗集《夜》,闻一多亲自为其绘制封面^①。也是在这一年,青岛大学学生臧克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《烙印》,闻一多慨然而为之作序。当时的北京大学学生卞之琳,后来回忆说:“我虽

^① 见闻黎明、侯立鹏编:《闻一多年谱长编》,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,第438页。

然不是闻先生的‘及门弟子’，但在我大学毕业前不久，在他从青岛大学调来清华大学以后，我也曾面聆过他写诗方面的不少教言。话，我都记不清了，只感到对我大有教益。尽管他出语有时显得偏激，胸襟却是十分宽博。例如，他早年写过不少爱情诗，却也面夸过我在年轻人中间就不写这类诗。又如，就外来影响说，他自己写诗，主要受过英国 19 世纪诗、特别是浪漫派诗的一些影响，但是，他也能欣赏我受过法国象征派诗一些影响的一部分不同的格调。又如，他自己讲究格律，但是他也完全不排斥我同时试写过的自由体。他自己治学谨严，写诗到《死水》阶段，用画法作比，可以说笔力遒劲，线条硬朗，但是，又举例说，他会就我一首日后自己废弃的松散的自由诗，不自觉的加了括弧里的一短行，为我指出好像晕色法的添一层意味的道理。”^①闻一多与学生一起谈诗、品诗，为学生诗集绘制封面、撰写序言，还“不自觉”地为学生改诗。这时期，闻一多、叶公超还合编《学文》月刊，刊发的也多是北京地区大学师生的著译。

1937 年，抗战全面爆发，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的格局都发生重大变化。但西南联大仍然继承了北大、清华等大学的传统，新文学创作的风气依旧强劲。朱自清、闻一多、杨振声、沈从文、陈梦家、李广田、叶公超、钱锺书、冯至、卞之琳等都曾在西南联大任教。西南联大外文系还聘请了威廉·燕卜苏任教。燕卜苏是英国的著名诗人，更是新批评的重要人物，其理论著作《朦胧的七种类型》在当时影响巨大。西南联大正是有了这样一些写诗、讲诗、关心诗、热爱诗的中外教师，才在学生中产生了一个诗人群。穆旦、郑敏、杜运燮、袁可嘉、王佐良、赵瑞蕻等，当时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。以穆旦为突出代表的西南联大诗人群，在中国新诗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。燕卜苏、朱自清、李广田、闻一多、冯至、卞之琳等人的理论、翻译、讲授、指导和鼓励，加上西南联大良好的人文环境，造就了这个诗歌群体。王佐良后来总结性地说：“中国的新诗也

^① 卞之琳：《完成与开端》，见《闻一多纪念文集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1980 年 8 月版，第 213 页。